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八一期 ——
(二〇一一年一月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101a)

【当事者言】	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	杨银禄
【文革一页】	也谈维特克访华与江青	丁凯文
【研究报告】	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述评(上)	唐少杰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当事者言】

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

• 杨银禄 •

◇ 一见如故，订立契约

1972年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北京发回一份电报：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副教授洛克珊·维特克夫人希望到中国访问，专门采访有关中国妇女革命的历史，请考虑作为友好人士予以接待。

7月19日至9月1日，维特克夫人应邀来华访问。在中国友协的安排下，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康克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维特克夫人。此外，会见她的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老革命家，是领导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人物。

一位普普通通的美国公民，受到这样高规格的接待和会见，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她想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便提出了会见江青的要求。她说：美国人知道宋美龄，却很少有人知道江青。她认为江青是当代中国最时髦、最有权威的女人，写一本关于江青的书，肯定会给美国读者带来震动。

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的呈文上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看到几位大姐会见维特克夫人的简报，又见到周总理的批示后说：“一位政治家如果想在国内有牢固的政治地位，没有国际舆论的支持是不行的。”她立即叫我打电话给姚文元，请他到钓鱼台10号楼，研究会见维特克夫人的事。

姚文元接到电话后，很快来到10号楼。他们研究后，江青对我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我精神还好，见见维特克夫人为好。我建议也请文元同志参加，请总理安排时间。”

8月12日下午3点钟，江青由姚文元陪同，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了维特克夫人。

江青和维特克夫人一见如故，两人毫无拘束。江青说：“哎呀，你真年轻、真漂亮。你是研究中国的副教授吧？我非常高兴会见你。”

维特克夫人对江青说：“见到你，江青夫人，我非常荣幸，非常感动。到中国来，而不见到你，那么我还算来过中国吗？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我太高兴了，太激动了。我非常愿意写你个人的历史，因为你的历史和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分不开的。写你，一定会有意思。”

“是的，”江青接着维特克夫人的话茬儿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是，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谈妇女运动。我可不一样，我的面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讲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文化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我听说你回去以后，准备写本书，有关中国的书。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给你，我给你说，你来写。以前美国有一位著名作家叫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主席，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你就是第二个斯诺，你也将一举成名。”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到陕北苏区采访的美国人。他在《西行漫记》中第一次忠实地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首次发表了毛泽东的著名诗作《七律·长征》。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以一个杰出新闻记者非凡的洞察力，预言毛泽东“将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还揭示了毛泽东“将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的奥秘：因为他身上有着“一种坚定本质上的活力”、“一种不可思议的特质”。

江青为何在维特克夫人面前谈起斯诺？她的潜台词是：斯诺是一位美国人，30年代写了一本关于毛主席的书，一举成名。那时，毛主席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且在西方也成了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维特克夫人也是一位美国人，如果在70年代写一本有关江青的书，也会一举成名。她江青今后也会和毛主席一样成为党内的领袖，也会成为在西方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这叫互有需要，互相利用，对双方都有好处。

江青和维特克夫人的这次会见整整持续了4个小时，但江青仍觉得对这位洋女人讨好得还不够，还为她大摆了宴席。冷菜不算，热菜就有8个，外加北京特产——烤鸭。本来是礼节性的会见，结果变成了胡吹乱侃的会谈。

◇ 不听劝告，一意孤行

1972年8月25日下午4时，江青约维特克夫人到广州远郊老虎洞林彪原来的别墅继续会谈。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科长的唐龙斌负责礼仪，新闻司副局长张颖做具体联络工作，另外还有英文翻译小沈，一位速记员，对外友协的负责人老丁和陪同老陈、小俞。

在一张长方形大桌子上，摆开了三张“西北战场图”，长茶几上放着两个可移动的麦克风，连接着录音设备。张颖凑到江青身边，低声说：“维特克夫人对战争没有兴趣。周总理叫我转告你再谈一次就够了，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维特克夫人的签证是28号，不要再延期了。”江青装作没听见，把话题转到衣着上，对总理的意见置之不理。

江青亲热地拉着维特克夫人的手走进会议室，对维特克夫人说：“我的谈话怕你记不下来，你就不要作记录了。否则，你既听不完整，记不完整，也记不准确，你注意听就是了。所以我今天特意录音，把我所谈的全部内容都录下来。我不仅给你全部录音稿，而且录音带也全部送给你。”

虽然江青承诺把录音带和记录稿将来送给维特克夫人，但维特克夫人怕江青的承诺不能兑现，所以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还是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

外交部的同志提醒江青：“送录音带的事别说得太肯定了，免得以后麻烦。”江青装作没听见，对着麦克风大讲她在西北战场作战的经过。

江青说：“那时毛主席在指挥西北战场，我也在那里，在毛主席身边，协助毛主席指挥。”维特克夫人看到“西北战场图”很感兴趣，说：“你这些图画得那么清楚，连行军时间表都在上边了！但是，你刚才对我说的我却没有记清。”“这些地图都是为你画的，”江青兴奋地说，“你将来写书的时候是有用的。”

会谈进行了5个多小时，江青用丰盛、美味的广东菜肴招待维特克夫人。宴罢，江青接着谈战争：“撤离延安的时候，所有的女同志都离开了作战部队，先过了黄河，只有我一个女的始终留在西北战场，继续参加战斗……我时时为毛主席作参谋，我们共同指挥，一直到胡宗南的军队被消灭。”

维特克夫人几次向陪同她的外交部的同志表示：“我对战争没兴趣，想听听江青私人的故事。”外交部的同志把维特克夫人的话翻译给江青时，江青说：“我当然会给她讲的，忙什么？西北战场就是我的故事。你应该告诉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指挥了战争。”

江青讲她如何“指挥战争”的故事足足讲了十几个小时，才接着讲她的私人生活。

◇ 逸闻趣事，胡诌一气

当讲起自己的名字时，江青说：“我第一个名字叫李云鹤。鹤是一种轻盈美丽的鸟，两条腿很美。我小的时候，两条腿也是细长细长的，所以我父亲给我起名叫云鹤，鹤立鸡群嘛。我的名字和我以后的情况完全一样，我确实出众嘛。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天上有彩云，仙鹤在空中轻盈地飞翔，多么美丽，多么富有诗意。”

“我到上海以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看我长得很美，很喜欢我，非要给我起个名字。当然喽，给一个电影明星起名字也是他的骄傲。他给我起名叫蓝平。后来，有人写电影海报时，把蓝平的‘平’写成苹果的‘苹’，我觉得这个名字也是蛮不错的。蓝色的苹果，与众不同，有新意。平常的‘平’没有特点，没有特殊的意义。以后在电影字幕上和我自己写文章署名，都是用‘蓝苹’这两个字。”

“我现在的名字可不得了啦，国内外都知道。你知道吗，江青这个名字是我到延安时自己

起的。大海浩瀚，江水滚滚东流去，多么有气魄。江水是蓝色的，清清的江水，多么迷人，多么有诗意。我最喜欢蓝色的旗袍，线条是很美的。从政治上说，青出于蓝胜于蓝嘛。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江青继续得意扬扬地向维特克夫人夸耀她的名字：“我还有一个名字叫李进。你读过毛主席的一首很著名的诗词吗？我给你背一背：‘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首诗词是毛主席赠给李进的，李进就是我。”

当讲到自己的家庭时，她说：“我的父亲是个木匠，是做大车轱辘的，虽然赚了一些钱，但生活还是很苦很苦的。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没有吃过好吃的。学校离我们家较远，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在学校只能吃一两个烧饼，喝一瓶蒸馏水。我的父亲脾气很坏，是一个骂人艺术家、打人专家。他原来有一个老婆，因为不会生孩子，又娶了我的亲母亲。他几乎每天都打骂我母亲，有时把我母亲打得跪在地上求饶，还是不停地打。有时我母亲怕挨打就偷偷地钻进柴火堆里躲起来。有一年元宵节，我父亲把我母亲的一只小手指打断了。母亲实在受不了那种折磨，趁着漆黑漆黑的夜晚，就领着我走夜路回到我外婆家。父亲找到我们以后，母亲又遭一顿毒打。自从那以后，我特别怕走夜路。唉，我现在想起我父亲打骂母亲时的凶相还不寒而栗呢。”说到这里，江青两只胳膊抱在胸前，说：“那种情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江青顿了顿，用手理了理额头的一缕发丝，继续讲她的经历：“我的原籍是山东省诸城县，1914年出生。哪一天出生我不说，保密，因为说出去，怕大家给我祝寿。1929年，我们村里有一个地主看我有出息，主动出钱把我送到青岛艺术学校学习。之后，他还经常给我捎钱去。学校免费，上学条件比较优越。后来，应一个朋友的邀请，我到了上海搞艺术工作。在那里，我演过《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等。我演了这几出戏以后，一举成名，走红啦。1937年，我放弃上海的优越条件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我是挺着胸、昂着头进延安城的。”

说到这里，江青停顿了一下，闭了一会儿眼睛，继续说：“在上海，一个电影明星，物质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心情郁闷得很呀！到了延安，一看到红旗就激动得潸然泪下呀！”

江青揉了揉眼睛，又指了指维特克夫人，说：“你没有我那种经历，是体会不到我那时的心情的。哎呀，还有一点我没有讲到，请允许我补充一下：30年代，我在上海，虽然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还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主要是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最主要是领导文艺运动。那时候，鲁迅是革命文艺的旗手，了不起呀！鲁迅对我是很欣赏的，不仅对我演的戏，对我的文章，对我个人，都是很欣赏的。鲁迅说这是个真正的革命的女性……周扬、夏衍、田汉他们围攻鲁迅，也围攻我。鲁迅逝世的时候，我们文艺界为了纪念他，集会游行，我走在最前面，表达了沉痛的心情。”

接着，江青喋喋不休地讲她的姿色：“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他们使用了各种手段，疯狂地追逐我。有一次很有趣，是你们美国人，一个水兵，喝醉了酒，摇摇晃晃地在外滩上，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拦住我的去路，向我敬了一个滑稽的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那家伙嬉皮笑脸，走近我，双手伸过来了，想占我的便宜。我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嘻的，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了一声对不起，走开了。你别看我现在领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富于感情了。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的，背点给你听听。”

江青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就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一个上海小调：“我呀，小妹妹哩，舍不得……咿呀呵咿呀……哈哈……”

在广州，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第一天，就给我们下了命令：“我跟维特克夫人谈话的内容非常重要，你们每天都要坐那里认真听，认真学习，好好受教育。”说实在的，我们不愿意听她胡诌乱侃，人虽坐在那里，但没有听进去多少。

我坐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平时高傲、冷漠的江青，现在为了讨好一个年仅34岁的外国妇女，竟然不知羞耻地谈起她的罗曼史，哼粗俗小调，真是大杀风景。我们在场的人都感到无地自容。

江青为了使维特克夫人看到她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她树碑立传，能早日扬名于全世界，陪同维特克夫人吃山珍海味，一起游览公园，乘火车专列到石湾参观陶器工艺品厂，赠送象牙裁纸刀、特制书签、檀香扇等工艺品，赠送线装《古诗源》、《二十四史》等书籍。她还每天用新鲜的茉莉花、白玉兰做成花环，戴在维特克夫人的脖子和手腕上。我怎么也想不到，平时威风八面、神气十足的江青，竟在一个晚辈面前低三下四起来，真是有辱国家尊严啊！

江青生怕维特克夫人对她印象不深，写书材料不足，一再劝说维特克夫人推迟回国。她对外交部的同志说：“维特克夫人的机票一定要改期，有什么损失完全由我方负担。如果误了她讲课，损失也由我方负担。”

当外交部的同志向江青婉转陈述说“维特克夫人推迟回国不好”时，江青竟然下达了命令：“把维特克夫人的回国日期推迟几天，立即给我去办！”外交部的同志无奈，只好请维特克夫人推迟行期。

就这样，从8月25日至8月31日，前后共谈了7天，每天谈一次，短则五六个小时，长则达八九个小时，共谈了60多个小时。

在为维特克夫人送行时，江青说：“希望早日看到你写的我的传记，预祝你成功！”

回到北京以后，江青就忙着组织人整理她与维特克夫人几十万字的谈话记录稿。这可把整理稿件的工作人员忙坏了，送了一稿又一稿，她均不满意。不满意就改，改了一次又一次。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江青的谈话整理成文。

◇ 领袖干涉，立即刹车

文稿送给周总理以后，周总理对此非常慎重，于1972年底召集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和整理记录稿的工作人员开会。周总理在会上郑重宣布：“经请示毛主席，记录没有必要送给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第二天，张颖等有关人员把所有的记录、草稿、铅印修改稿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文稿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部放进一个保险箱里，加上封条交给了外交部保密室。

会后，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我，问：“江青同志跟维特克女士的谈话录音带有多少？”我回答：“这些录音带是用装电影片子的铁桶装的，有两桶。”周总理又问：“有人借走过吗？”我说：“没有。我怕丢失，在广州上飞机以前就用密封条封好了，到现在密封条都没有撕掉。”

周总理表扬说：“那好，你办事还是蛮认真的。这些录音带请你保存好，绝对不能丢失和外传。先放在你那里，如何处理，以后再说。如果有人要借，请你直接打电话给我，经我批准后方可。主席那里除外。”我说：“请总理放心，坚决按照总理的指示办！”

维特克夫人虽然未能得到江青跟她谈话的记录稿和录音带，但在回国以后还是根据自己的记录开始写江青传记，题目是《江青同志》。这本书出版后在西方成了畅销书，第一次就印了3.5万册，以后又不断重印。

1974年5月3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了江青跟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

5月10日，周总理叫秘书赵茂峰给在江西“五七”干校的我打电话，询问江青同维特克夫人的谈话录音放在何处，我告诉他放在10号楼秘书保密室的西南角。赵茂峰还说：周总理问你们在那里习惯不习惯，请你们注意身体。后来我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看到美国的报道以后，正在调查处理此事。

□ 《党史博览》2010年第10期

~~~~~

### 【文革一页】

#### 也谈维特克访华与江青

• 丁凯文 •

美国学者罗克姗·维特克女士（Roxane Witke）1972年夏访华并见到江青一事，在文革当中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是由于当事人江青在1976年10月被打倒，在1977年揭批“四人帮”反党罪行时，江青曾于1972年8月会见维特克女士一事也被渲染成“江青里通外国，卖国求名”，在1977年的中发[1977]37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里，江青被指责为“抗拒周总理的指示，私自同维特克谈话七次，长达六十小时。她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肆意编造历史，美化自己，贬低和诽谤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她大量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奉送重要军事地图和机密资料，里通外国，卖国求名。”而作为历史学者的维特克女士因对江青的访谈，无端卷入这场中共自己的党内斗争，遭了池鱼之殃，日后更由于坊间所传言的《红都女皇》一书，维特克本人被张冠李戴，成为传言之中心人物，“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一幅漫画中，江青被描绘成用“党和国家的机密”无耻地换取维特克赐予的“红都女皇”的桂冠。近几年来已有文革史家余汝信撰写两篇文章深入探讨这一事件（余汝信《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见枫华园电子杂志第448期，2004年4月30日，还见“林彪·军队·文革”网站，“余汝信文集”；余汝信《新瓶里的旧酒——新书〈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的旧思维》，见《记忆》电子杂志第6期，2008年10月30日，还见《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677期，2008年11月18日）然而，国内出版的有关书刊、文章鲜少对维特克女士做客观、公正的评论。有感于此，笔者愿就此事谈些个人的看法，就教于方家。

#### 一、中共领导人和中央文件等对维特克的评论

笔者见到的中共领导人讲话中最早谈及维特克访华一事的是华国锋。1976年10月7日，也就是华国锋主导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华国锋在接见山东、湖北、江苏、上海和南京、济南、武汉部队的领导人时发表了讲话。华国锋在讲话中称：“美国记者维特克，是情报局

的，江青和她谈话，把中央很多东西传出去，讲了很多下流的话，对毛主席有很大的污蔑。”（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 2006年版）

1976年10月12日接见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等人时，华国锋又说：“江青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谈了六次，贬低主席，内容下流。‘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华国锋的这次谈话不再称维特克女士“是情报局”的，将这顶“特务”帽子从维特克头上摘了下来，尽管称维特克是“作家”，仍然不能算准确。这里华国锋所言的“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看来并未成功实施，但仍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为了坐实江青“里通外国、卖国求名”，中共中央在1977年9月23日下发了3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文件中罗列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新华社揭发姚文元利用职权掩盖江青里通外国的罪行”和“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的揭发交代”。其中“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最具爆炸性：“江青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认为这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的大好机会，无视周总理批示，在北京一次就见了六个小时。”“周总理指出：维来华后期表现不好，思想反动，来历又未弄清，要江青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江青听了接待人员转达周总理的指示后，大发雷霆，叫嚷：‘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她一意孤行，又同维谈了六次，连同前一次共谈了六十小时。”“江青为了掩盖她里通外国的罪行，伙同王洪文强令收缴有关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材料，销毁罪证。”事实上，维特克女士是得到中国方面的邀请访华而见到一些中国妇女界领导人，如邓颖超、康克清，经过周恩来的批准与安排乃至最终见到江青，未知何以周恩来称维特克“来华后期表现不好，思想反动，来历又未弄清”。张清化的揭发则称，江青“谈完后，当场即将《解放战争开始前形势图》、《我军战略反攻形势图》、《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图》、《西北战场作战过程形势图》、《辽沈战役概况图》、《平津战役概况图》、《淮海战役概况图》和《解放战争三年半战绩统计表》等重要图表，拱手送给了维特克。”“以上图表的内容大部份是我们没有公开的。江青里通外国，出卖了大量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

此后国内出版的相关回忆录，如张颖的《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张颖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负责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邬吉成、王凡的《红色警卫》等书对此大都口径一致，沿袭了中共中央的定论。比如，《红色警卫》一书说：“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她（指江青）竟然置组织纪律于不顾，泄露了大量党内的机密。她把政治、军事、外交、人事、资源等多方面的重要情况告诉维特克，还把一些机密的作战地图和照片，送给维特克。”（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211页）大陆作家叶永烈说得更直白：“她（指维特克）访华的真正采访目标，是江青。”“也真巧，维特克希望访问江青，而江青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斯诺’——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需，也就一拍即合。”（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下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版1116—1117页）

以上情况表明，中共中央高层虽然未必认定维特克女士真的负有某种特殊使命，但是由于江青是被打倒的“反党、反革命集团”首犯，因此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也要上纲上线，冠以“里通外国”、“泄露国家机密”的大帽子，而维特克本人则被动地成为江青“里通外国”和接受中国“国家机密”的承受人，也许这就是为何中央文件要借周恩来之口说“维来华后期表现不好，思想反动，来历又未弄清”。可笑的是，既然周恩来认为维特克“来历又未弄清”，何以当初主动建议江青与其会见呢？而大陆的作家们，仅仅因为维特克与江青的几次谈话被中共中央点名，就将其纳入“另类”，事事都要从反面加以诠释，不亦悲乎？

## 二、维特克女士对中国的研究

维特克女士本科就读于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维特克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现代中国在五四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Transform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s Women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 of Modern China)。值得一提的是，维特克就读的这三所学校都是美国顶尖的大学，在学术上均享有盛誉。此后维特克在美国一些大学的学术机构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如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等。维特克的研究范围着重于近代革命的中国和当代中国社会，也为美国国务院就中国事务提供咨询，并参与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会。维特克女士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亚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以及“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发表多篇文章。例如，维特克在1967年《中国季刊》上发表了《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妇女与自杀》(Mao Tse-tung, Women and Suicide in the May Fourth Era)，1979年2月维特克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文化革命之后的中国》(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维特克女士专注于中国妇女的专题研究，与Robert Riden合作著有《红旗飘飘：“红旗飘飘”文集指南》(The Red Flag Waves: A Guide to the Hung-chi piao piao Collection)，1968年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与Margery Wolf合编《中国社会中的妇女》(Women in Chinese Society)，1975年12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维特克在访问中国前是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历史系的副教授。

这里顺带一提的是，大陆作家叶永烈否认维特克是副教授，叶说：“当时中国报纸称她是副教授，实际上她只是‘助教授’”(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下卷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年1月版 1113页)。这是叶永烈对美国学校教职缺乏了解之故。美国大学的教职分三级：“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和教授(professor)。拿到副教授相当于有了终身教职，学校如非有特殊原因不能随意解聘。而维特克当时就是该校的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笔者从以上搜集到的不完全资料来看，维特克教授是长期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尤其是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研究的严肃、严谨的美国学者。正是由于对中国现代历史和妇女问题的研究，维特克期望亲自走访中国，实地观察、了解乃至访问中国和中国妇女领导人，这就是维特克1972年访华的初衷。维特克在纽约通过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交往，获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在1972年夏“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中国，对外友协则承担维特克在中国期间的所有费用。(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年出版，英文版19页)

## 三、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

综合张颖的《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杨银禄《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和维特克本人所著《江青同志》一书，兹将维特克与江青谈话的大致经过罗列如下：

(1) 维特克到中国后向负责接待的对外友协提出希望采访的人员名单，包括时任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在与一些历史学家、医生和艺术家的访谈之后，维特克见到了邓颖超和康克清这两位中国妇女界的元老。中国对外友协还向周恩来呈报了维特克希望见到江青的请求，周恩来在对外友协的呈文上作了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0页)江青看到邓颖超、康克清会见维特克的简报，又见到周恩来的批示



后说：“一位政治家如果想在国内有牢固的政治地位，没有国际舆论的支持是不行的。”江青提出要见维特克，并请周恩来负责安排接见事宜。（杨银禄《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见《党史博览》2010年第10期）

杨银禄认为“一位普普通通的美国公民，受到这样高规格的接待和会见，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她（指维特克）想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便提出了会见江青的要求。”（同上）杨银禄此言对维特克颇有贬义，显然有失公允。维特克作为研究中国妇女运动的学者，受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访华，当然期望认识、了解更多的中国妇女界领导人，包括江青在内。但是江青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不容易见到，期望得到江青接见应属奢求，维特克自己开始也不抱过高的期望。维特克回忆说：“下榻北京饭店后不久，我被要求起草一份旅行计划，提交一份我想采访的人的名单。旅行计划比较简单，列出一些主要的景点和城市，而我列出的采访对象有预期可以见得到的和一些看起来不可能见到的人，其中也包括本书的主人公，那不过是出于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和革命文化的权威形式上的敬意。那时我没有抱任何希望，而且因为她令人生畏的声望，我也没有指望要见到她。”（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22页）安排江青会见维特克是周恩来主动为之。杨银禄揣测维特克求见江青的动机是“想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纯属臆测，并无事实根据。叶永烈更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说：“维特克来中国了解现代妇女运动，所获甚少，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热烈的握手，表明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下卷1117—1118页）不知叶永烈有何事实和证据证明维特克“所获甚少”，又有何证据证明维特克“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叶永烈将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贬斥为“一拍即合”纯属毫无道理的偏见。

（2）张颖指称江青在谈话中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你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3—24页）杨银禄的文章则与张颖的回忆大致雷同。其实，无论是张颖的回忆还是杨银禄的回忆，都是1977年下发的37号文件的翻版，该文件里的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揭发材料就称“江青与维一见面，就要维为她写传记。她对维说，‘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我谈的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能走斯诺的道路’。”（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年版）众所周知，中共为了达到批倒批臭自己对手的政治目的，这类由中央下发的揭批材料的可信度和真实性都极低。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人们仍然不加分辨地予以引用，难免不被误导。

维特克书中则完全没有这一情节。维特克记述说：“她（指江青）转到另外一个话题，她说周总理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建议她应该接见哪些外国客人。当埃德加·斯诺的夫人路易斯·维拉·斯诺1970年9月来北京访问的时候，为她安排了一次接风，当时时间短促，江青正在家中小酣，即被召集参加。由于事先没有通知到，她一时不知道应该送给尊贵的客人一份什么样的合适礼物。而在斯诺夫人这一边，也被搞得一团糟，结果意外地把本来准备送给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礼物送给了江青！‘你见过斯诺夫妇吗？’她问道。虽然曾经读过很多斯诺写的书和文章，我没有见过他们，对于他的作品我们只聊了几句。然而，我和他的前妻尼姆·韦尔斯有联系，她曾经在1930年代末期采访过中国的女性革命领导人。‘他现在的妻子对中国也非常友好。如果你见到她，请转达我对她和她的家人的问候以及欢迎她再次来访。你成为中国的朋友后，你也可以经常来看看我们。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接待你。’”（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29页）江青如果当场要求维特克为自己写书出传记，维特克应该不会遗漏。维特克是根据自己的记录和中方提供的记录稿所撰，在1977年出版《江青同志》一书，距1972年不过仅仅4、5年而已，而张颖的回忆却是在25年之后的1997年问世。此外，笔者在2010年

11月感恩节前后，设法联系上住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维特克女士，向她求证这一情节。维特克向笔者证实江青在谈话中从未要求维特克为自己撰写一部传记。由此可见，张颖的回忆确有事后丑化、脸谱化江青之嫌。

（3）江青主动安排在广州继续与维特克的谈话。在北京与江青谈话后，维特克又与邓颖超等其他妇女界领导人会谈了四天，在此期间，江青还不断派人带来江青的讲话、照片和一些艺术品。随后，维特克转去上海访问。维特克自己承认她并未期待能再次见到江青。8月24日维特克在上海访问时，突然被告知江青要在广州再次与她见面。（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34—37页）8月25日到8月31日，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进行了7天，每天谈一次，短则五六个小时，长则达八九个小时，加上第一次在北京的谈话，双方共谈了60多个小时。据张颖的回忆，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的主要内容涉及：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战争情况，江青意图说明她当时与毛泽东在一起，共同指挥了战斗；江青个人早年的革命经历和与毛泽东的婚姻，以及一些家庭情况；三十年代上海党组织与鲁迅相关的一些情况；中共建国后江青参与的一些文艺方面的工作，如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以及《红楼梦》评论等；建国后中共党的一系列重大活动以及党内斗争；江青自己搞的文艺革命，其中涉及京剧、话剧、电影、音乐、舞蹈、体育等。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内容广泛，涉及面很多，但张颖认为江青的谈话“没有逻辑、胡编滥造”，江青的目的是“有计划地为自己树碑立传”，江青“有些话故意说得不清不楚，这就可以让维特克去编造去发挥。”（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99页）姑且不论江青的谈话是否“没有逻辑、胡编乱造”，笔者认为，江青虽然不是一个有条理有才华的叙事者，她的谈话往往有些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但是张颖由此而认为这是江青故意让维特克去编造历史写故事，显然只是一种个人的臆测，也未免低估了维特克作为历史学者的专业素养。

关于广州谈话的内容，维特克在书中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交代，如江青在上海的经历，特别是涉及“左联”以及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等。维特克特别强调江青力图给人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的印象，维特克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她（指江青）建议把她的生活经历放在革命这个大背景下。当一个人把革命经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任何个人的作用都显得微不足道。”维特克说：“我们谈话的模式都是从傍晚开始，持续了六天，间或休息时用些晚餐，然后继续我们的谈话，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有一次，我们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和当天下午还各进行了一次额外的谈话。这样，江青以这种君临天下的帝王般的无产阶级特色进行谈话，她经常兴致所至漫无边际地讲述她的革命经历。”（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41—42页）

如上所述，维特克在书中没有只言片语涉及江青明确要求维特克为自己写书的内容，且维特克也对笔者亲口予以否认。杨银禄却说：“在为维特克夫人送行时，江青说：‘希望早日看到你写的我的传记，预祝你成功！’”（杨银禄《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见《党史博览》2010年第10期）但是另一个当事人张颖的详尽回忆却没有这个内容。很难想象，江青会这么迫不及待地明确要求维特克为自己树碑立传，而当事人维特克对此竟然不置一词，置若罔闻。看来杨银禄的回忆也难免流于党文化的窠臼。

毛泽东在世时，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西方世界常常用“铁幕”二字来形容共产国家。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仅仅是打破坚冰的开始，西方迫切地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中国也有同样的要求。江青同意接见维特克，当然有自己的打算，希望通过维特克向国际世界展示自己的一切，树立一个个人的“光辉形象”。西方学者从其自身的立场出发，一定会在访谈后发表自己的看法或出版自己的专著，根本无需中方人士刻意地提示，那样反而会弄巧成拙。江青也不至于笨到这种程度低三下四地恳求一个初次见面的外国人为自己树碑立传。站在维特克的角度，维特克的中国之行能得到江青接见，显然出乎意料，原先有关中国妇女的研究计划无形中被“江青”这个特殊的课题所取代，这也属正常。所以，维特克回美后撰写一部有关江青的书

籍是件毋庸置疑之事，至于怎样撰写与何时出版则是维特克自己的事情，无需外人置喙。反倒是大陆的一些作家戴着有色眼镜刻意曲解维特克访华事件，以配合官方批判江青“篡党夺权的野心”。

中方人士的回忆与著述之所以存在某些严重的问题，关键在于人物的脸谱化，以官方的是非为是非。江青作为文革中的政治人物，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解析、研究，而非事事丑化。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是周恩来从中牵线搭桥，无论双方谈几次，都不能看成是江青的错误，即使江青心中希望维特克回美后写一本关于她的书籍，也谈不上是什么罪行。至于江青“出卖党和国家军事机密”也是子虚乌有。江青交给维特克的地图仅仅是毛泽东在20多年前在陕北的行动路线图，江青意在说明她是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唯一女性（江青在1980年代的“两案”审判中也曾在法庭上提及此事以质疑法庭的合法性）。站在维特克的立场，维特克与邓颖超和康克清的多次谈话从未见中国官方予以质疑或批判，为何与江青的谈话在“四人帮”倒台后就变得大逆不道？由此可见，谈话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与江青谈过话的海外人士并不少，如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关键是维特克抵制了中国官方在事后的无理要求，引发了中国官方的不满，而韩素音这类对中国“友好的作家”处处迎合中国官方的宣传口径和需要，因此无论何时都是官方的座上宾。

根据张颖的回忆，“1972年的岁末，周恩来总理又召集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恩来只简单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163页），且“当时保存在保密室的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记录材料，全部都被江青搬走了。”“江青不仅是取走了全部记录材料，并且全部烧毁了。”（同上，165—166页）。杨银禄也说：“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我，问：‘江青同志跟维特克女士的谈话录音带有多少？’我回答：‘这些录音带是用装电影片子的铁桶装的，有两桶。’周总理又问：‘有人借走过吗？’我说：‘没有。我怕丢失，在广州上飞机以前就用密封条封好了，到现在密封条都没有撕掉。’周总理表扬说：‘那好，你办事还是蛮认真的。这些录音带请你保存好，绝对不能丢失和外传。先放在你那里，如何处理，以后再说。如果有人要借，请你直接打电话给我，经我批准后方可。主席那里除外。’我说：‘请总理放心，坚决按照总理的指示办！’”（杨银禄《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见《党史博览》2010年第10期）文革史家余汝信问得好：“问题是张颖称当年‘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江青把封存在外交部的所有记录材料都搬走，而且烧毁了。’那末，二十多年后‘实录’中这些谈话‘记录’又从何而来？凭过人的记忆还是凭想象？”（余汝信《新瓶里的旧酒——新书〈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的旧思维》）亦或是张颖违背组织原则私下保留了江、维谈话的记录稿？

#### 四、维特克回美后的工作

根据张颖的回忆，维特克回美后，江青立即组织专人为她整理谈话内容，并请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审读，周恩来也确实阅读了江青谈话的第一部分，并作了适当的修改。张、姚二人对整理的谈话内容没有表态。周恩来此后召集曾参与会谈的外交部、对外友协人士开过几次会，对是否将整理稿送给维特克一事拿捏不定。后周恩来经请示毛泽东，所有录音带、会谈整理稿全部封存、归档，不许外泄，更不可能送给远在千里之外的维特克。（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154—163页）江青虽然权倾朝野，当初曾信誓旦旦地答应送给维特克录音带和记录稿，这次却在毛泽东和党的机器面前败下阵来。

维特克记述说：“在我1972年返回美国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通过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他的夫人何理良提供的外交渠道，江青和我互相交换了很多书籍和照片，两部故事片以及各种消息。然而那些余下的录音文稿的交付问题几个月后还是杳无音讯。我不时地收到传来的消

息，说他们用两种语言（中文和英文，就像第一次那样）准备文稿工作量很大，但很快就会搞好。终于在1973年5月何理良代表大使和其他同志正式通知我，我和江青的谈话记录‘过于冗长、很繁杂’，不宜作为有关党和政府的正式报道发表。她向我保证（她和大使在其他场合多次重复了这个指令），我可以自由出版第一份记录手稿（这份手稿与后来江青告诉我的完整的经历密切相关），也可以出版我自己的记录。但我最好不要写成本‘传记’（这会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即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而非领袖创造历史，而且中共认为毛才是真理和智慧的唯一化身），要‘以毛主席的观点’撰写一部中国革命史，其中包含一章或两章有关江青的内容。”（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13页）

维特克显然不知道中国高层内部运作的机制与过程，当然对中方的食言自肥有些烦恼。维特克说：“除了第一份记录稿以外，后来的录音文稿都没有交给我，开始我还为此很烦恼，后来又觉得很好奇，因为我发现我面对的是中国领导人内部明显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人对我显得不太自然的热情中，我察觉到了细微的焦虑，我知道这只是复杂、深刻的分歧和裂痕的外在表现。仅仅阅读毛主席的总结讲话和指示，那些内幕不可能为中国的公众所知。但从长远来看，由于他们最终做出的不交给我江青谈话的官方版本的决定，使我有出版这本书的自由。这样我可以写下她说的话，外界的有关评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解读，而不仅仅是作为江青的传声筒。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是其中的一部分。例如，江青一直答应会把录音文稿交给我，而且我在中国之时她从未食言，难道是她自己突然改变决定不把文稿交给我吗？这个决定会不会是出自毛的指示？也许毛受到一些人的挑唆，而那些人对江青蔑视不搞革命英雄主义的原则、为自己歌功颂德、泄露领导人之间残酷斗争的内幕，以及轻率地发表与毛或集体意见截然不同的论调而心怀怨恨？”（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13—14页）

然而，中方并未停止施压。维特克说：“最后，在1974年1月，何理良（她那时刚在北京呆了三个月）再次敦促我不要出版一本完全是传记形式的书，或我所谓的‘江青同志眼中的革命史’。她问我是否还记得‘五月通告’（1973年5月她和黄华警告我不要写传记），同时提出只要我答应他们的要求可以给我金钱补偿。我自然是拒绝了。出于对江青最初的意愿和对历史的尊重，我认为这些独一无二的记录不应该被埋没起来，所以我继续准备我的出版计划。”（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14页）张颖在自己的书中否认中方曾设法收买维特克版权的说法（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178页），但是证诸华国锋在1976年10月12日与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等人谈话时所说“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中方的确采取了某些行动，只不过遭到维特克的抵制，未能奏效罢了。

虽然中方最终拒绝了提供相关的记录稿，维特克还是着手开展自己的写作。为了进一步了解江青早年在上海的生活、工作情况，维特克专程到了法国巴黎，希望见到江青的前夫唐纳（马绍章），以便得到更多的写作素材。唐纳当时在法国巴黎经营一家餐馆——天桥中餐馆。1973年6月的一天维特克与唐纳在巴黎唐人街一家名为“唐城酒家”的中国餐馆会面，维特克希望唐纳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有必要对历史负责，能够提供更多外人所不知的内情。令人遗憾的是，维特克的请求被唐纳所拒绝。（窦应泰《唐纳拒绝同威特克合作的一笔“生意”》，见《中外书摘》2007年第10期）虽然窦应泰试图把维特克描写成投机钻营，唯利是图，专门撰写花边新闻和小道消息的无聊文人，但是恰恰反映出维特克作为历史学者对历史负责的认真与执着。

维特克自己说：“经过我稍稍编辑修改过的采访报道，同时又带有自述回忆录的特征，从长远来看不是为哪个人服务，尤其不是为了江青——她对世界的看法需要一番解释。就我们之间的文化和阶级碰撞和冲突来说，如果仅仅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对这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凭着感觉匆匆做出评判，就会辜负了她冒险披露的她对个人和历史见证的本意，也无法进行探索。我

没有这样做，我宁愿选择用这样的风格来表现她：用和她在一起之时的经历来完善她的叙述，并以我对她个人和其世界的近身观察及冷眼旁观。正如她曾好几次自信地对我说的那样，因为我不是一名记者，而是一位历史学家。”（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16页）通过对这段话的理解，维特克显然并非仅仅根据与江青那60个小时的谈话而匆忙成书，维特克尚需作更多的准备工作，诸如收集更多的相关资料，加深对中国革命和中共历史的深入研究等。

从中国回美后，维特克在斯坦福大学呆了一年，又在哈佛大学呆了两年。这两所大学都是美国大学里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问题的顶尖学术机构，不仅有崇高的信誉、众多的学者，还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大量的中文书籍。维特克在这两所学校应是为她自己的写作做必要的准备。在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维特克的《江青同志》在美国问世。整个西方世界在此之前从未有一部有关江青的传记，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长久以来深居幕后，外人知之甚少，直到文革爆发，江青才一鸣惊人，在毛泽东的扶植下一夕成名，一跃而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整整十年。而西方世界对江青的了解却微乎其微，所得到的信息大都来自官方新华社的报道，缺乏感性的第一手资料，而维特克的近身采访、实际接触弥补了这一缺陷，尽管这一访谈后的写作未必尽善尽美，但却填补了一项空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书书名朴实无华，绝无“红都女皇”一类哗众取宠的噱头，而是取自中共领导人常常自称的“某某同志”，如周恩来同志、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等等，中国人读到如此熟悉的语言也许会发出会心的一笑。

张颖粗读了《江青同志》英文版后也承认：“江青谈话中的许多细节，作者都作了相当具体详尽的记述”，“全书基本上是按照江青谈话的内容梗概来撰写的”。张颖同时承认“作者并没有一味吹捧江青，而是有她的一些分析和看法，还补充和修改了江青谈话的一些内容。”张颖将维特克没有“一味吹捧江青”归结为“江青一伙已经垮台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已起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176页）。换句话说，按照张颖的逻辑，如果江青还在台上，维特克一定会出版一部对江青歌功颂德的书，这实在是对西方学者带有偏见的看法。江青在台上掌权时，维特克尚且拒绝中方对其写作的横加干涉和无理要求，更拒绝了中方的收买，维特克有什么理由听从江青或中方的指令撰写一部迎合中共领导者心目中的“中国革命史”或“江青传”？如果那样的书在美国出版，作为历史学家的维特克岂非无地自容，还能立足于美国学术界吗？正如维特克书中所言：“如果主席或中央委员会要求一部纯粹歌颂江青的作品，他们大可自己编撰一份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予以传播。”（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15—16页）

中方为何千方百计地设法阻止维特克出版有关江青的书籍？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其实，仔细阅读《江青同志》一书，我们可以看出，中方并非完全阻止维特克出书，中方的真实意图是要求维特克配合，期望维特克书中的观点和内容符合中方的要求，即“以毛主席的观点撰写一部中国革命史，其中包含一章或两章有关江青的内容”。可惜的是，维特克并不买账，不理睬中方的劝告，仍以自己的方式撰写和出版关于江青的书籍，这使中方大失所望。阻止江青谈话稿送交维特克的决定应该是来自毛泽东，周恩来自己绝不敢冒抵制江青的风险。迄今为止，我们尚不清楚毛泽东出于何种考虑做出这一决定。笔者认为，后面事情的发展则是由于江青的倒台，官方出于“深揭狠批江青反党集团罪行”的目的，将这一事件人为地炒大，无限上纲，而维特克也就成为现成的江青“里通外国，卖国求名”的对象。

笔者还愿指出的是，大陆一些作者不是在学术上探究《江青同志》一书的得失，而是在维特克的所谓动机上大做文章，按照官方的口径人云亦云，似乎只要证明维特克采访江青是别有用心、图名为利，积极配合了江青“树碑立传”、“篡党夺权”的阴谋，即可否定维特克学术上的努力和成就。就事实而言，大陆的作家们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他们的这些观点。笔者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国内的研究者就《江青同志》一书作过任何像样的研究，相反，他们总是在子虚乌有

的《红都女皇》问题上打转转。这不能不说是大陆学术界的一大缺憾。

顺带一提的是，有关维特克与所谓的《红都女皇》的流言，文革史家余汝信对此已作了详尽而透彻的剖析，可参见本文开头部分所提示的相关文章。此处不赘。

## 五、持续关注中国事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外也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变化。1977年3月2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刊登了维特克的长文《江青同志讲述她自己的故事》(Comrade Chiang Ching Tells Her Story)。为便于不知江青是何许人的读者明白，封面上的标题改成了“毛夫人讲述她的故事”。这是维特克在返回美国后首次公开披露她在1972年夏的中国之行。维特克在文章中讲述了她的中国之行和与江青的谈话。文中记述了江青曲折、复杂的一生，从她的童年到演艺生涯，从上海到延安，江青与毛泽东的婚姻，毛泽东的家庭生活，中苏关系的矛盾与冲突，江青在文革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江青与文艺革命，江青对西方艺术的评论等。维特克指出，毛泽东曾在1966年7月给江青写过一封信：毛曾预言在他死后，反共的右派会上台，此信可以看成是毛给江青的政治上的交代……

1977年，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一书在美国正式出版，由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出版发行。此书日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日文等。但是，叶永烈称该书第一次印了三万五千册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里顺带一提的是，2006年香港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但是书名却冠以“红都女皇”，原书名“江青同志”反倒成了陪衬，这不仅违背了维特克的原意，且该书也未获得维特克的授权，侵犯了维特克版权，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1980年到1981年初，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理并判刑，美联社在1981年1月26日从北京发回报道《中国法庭判决毛的遗孀死刑》(Chinese Court Sentences Widow of Mao to Death)，该报道还配有一张江青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照片，维特克特别保留了当天发表在纽约地方报纸上的这条消息。

十年之后的1991年5月14日，江青在北京自杀身亡。同年12月维特克在《浮华世界》(Vanity Fair)第12期上发表长篇文章《毛夫人的最后日子》(The Last Days of Madame Mao)。在这篇长文中，维特克全面回顾了江青的一生，涉及到江青早年时期的活动，在上海和延安的经历，与毛泽东的婚姻，毛泽东家庭成员的状况，与中共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江青在文革期间的主要活动等。维特克用了较长的篇幅叙述了江青在1976年10月被捕和关押以及审判之后的生活经历等。

维特克在文中还提及1972年8月那段她与江青会面交谈的情景。维特克说：“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现代问题的历史学家，我作为客人受邀访问北京，与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以及其他长征老战士的夫人们作了访谈。江青知道此事后要求见我，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见面。”“在我与她交谈的60多个小时里，我发现江青身上充满了矛盾，我了解到江青对周围事务的强烈统治欲，直接了当且富有感召力的语言和喜怒无常的情绪，此一时充满了友善，彼一时却又仇恨满腔，尤其针对那些被她认为错待她的人或事。……当她讲述中共党史有关事件时，她的坐姿僵直，她的语调变得低沉，她的眼神趋向冷酷。但当讲述到‘江青是怎样脱颖而出’时，她看上去表情极为自然，她的肢体语言变得流畅，她的声调和举止毫无矫揉造作的女性化、敏感和引人入胜。”维特克认为，“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没有毛泽东，江青不可能爬到这么高的地位。然而人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江青这般全身心投入到她丈夫那一以贯之的最高权力的斗争，毛也许不会长期盘踞最高领导者的地位直至死亡。自1938年在延安他们相遇的那一刻

起，他们从来都没有背弃对方。”（《浮华世界》 Vanity Fair，1991年第12期138—141页）毛泽东与江青在政治上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从这一点来看，维特克比国内某些官方学者看得更清楚，更一针见血。

2006年5月12日到14日，在美国纽约召开了文化大革命40周年国际研讨会，不少媒体前来采访。会议召开前笔者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专门采访。BBC记者对笔者采访的前一天也专程采访了维特克女士，请维特克就文革史和有关的江青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事后BBC作了专门报道。据笔者所知，维特克虽然早已退休，但是仍然关心中国事务和发展，也关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

#### 几句题外话

走笔至此，笔者心生几许感慨。文革期间，中共曾制造了对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中国》的大批判，还制造了外贸部为引进彩电显像管考察美国康宁公司的所谓“蜗牛事件”。这两起事件在文革后都重新予以评价，承认那是在文革特殊情况下制造出来的闹剧。其实，维特克在访问中国后遭到的不公正评论与前两起事件颇有相似之处，不同之处是“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制造出来，且迄今为止无论是官方学者还是国内的当事人以及文学作者都无意予以重新评论。维特克访华与江青谈话和坊间传言的《红都女皇》毫不相干，维特克既没有非法获取“党和国家机密”，也没有昧着史学良知杜撰历史。正如维特克自己所说：“作为一个到访中国的历史学家，我只代表我自己，在我确认我所得到的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出版之前，我不会提供给任何人。此书将向普罗大众介绍江青的非常的一生以及与革命历史紧密相关的事迹。”

（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14页）事实证明，维特克是一位严谨、严肃的历史学者，为了研究中国妇女运动，她在文革期间克服种种困难访问中国，与中国妇女界领导人谈话，并与江青见面会谈，事后更潜心工作多年，在西方出版了第一部关于江青的传记，应该说这是维特克在史学研究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我们岂能因为江青是被官方定性的反面人物而由此否定维特克的学术成就？我们应该从学术角度研讨该书，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维特克访华事件，而非简单重复当年官方“揭批查”时搞出来的大批判材料，更不应人云亦云地在人格上抹黑维特克。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江青的倒台，维特克无端地被卷入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至今仍被中国的一些当事人和文学作者们所曲解、误判，难道人们不应认真地反省这段历史，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难道还要再继续流传下去吗？

□ 《记忆》第六十四期 2010年12月12日

~~~~~

【研究报告】

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述评（上）

• 唐少杰 •

本文试图述评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时期“教育革命”的诸多方面。毫无疑问，清华大学是文革“教育革命”的首要基地，也是“教育革命”首屈一指的样板。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在文革中的地位和影响不仅超过了其他任何大学，而且其本身就标志着文革的诸多取向和部分轨迹。即使在其破产三十余年后的今天，追溯并评析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这一典型个案，依然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深切的现实意义。

文革的“教育革命”既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与1958年的“教育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的许多现象和经验都在后者以及文革前的教育界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得以孕育或表现。清华大学先后于1958年和1960年全校上下进行了各为时数月的大张旗鼓的“教育革命”，就有着某些文革“教育革命”的种子或影子。例如，以“大跃进”的群众运动形式来办教育，盲目扩大生产劳动在教学中的比例；师生停课“大炼钢铁”；在教师中大搞“拔白旗”和“送西瓜”，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压制正常的学术争论，禁锢不同的教学主张；鼓励学生以“大跃进”的速度自编教材、讲义，贬低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倡导“阶级路线”，愈益加强以“血统论”为特征的“出身论”和“唯成分论”，注重以“阶级斗争”来干预和统率教育问题；不断强调政治标准高于学科知识标准；时常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降低教学质量；越来越趋向激进而荒唐、狂热而粗暴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政策；等等。尽管文革前的与文革时的“教育革命”不是等同的，但是人们对于清华乃至全国“教育革命”的直接由来和历史根源所作的分析和批判，其实远远不够。1971年8月颁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称赞1958年“教育革命”和指责1961年以后这一革命“夭折”，（1）就清楚地说明了文革“教育革命”实质上是把文革前“教育革命”所带来的片面和纰漏推向了极端。

然而，文革开始之际，由于打倒“走资派”和群众性的抢权、夺权等是当时的主要任务，“教育革命”还没有成为文革初期“狂飚曲的主题”。不过，这时延续着文革前教育改革的思想“惯性”，清华内外关于“教育革命”的许多讨论已经非常引人注目。例如，1966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在连续多期关于“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讨论中，发表了清华大学电机系电72班全体学生的来信。此信提出：（1）工科大学一律实行半工半读。（2）学制缩短为二、三、四年，现有大学生提前毕业。（3）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毛主席著作为首位教材，并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生产劳动和军训，教学以生产实践为主。（4）改造教师，今后工科大学教师应该同时是工人，是生产者。（5）废除研究生制度。（6）大学招收工农兵，不必具备高中毕业生水平。

在文革第二年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中，尽管“教育革命”的实践还没有排上文革的主要议事日程，但是群众造反派已经把“教育革命”问题纳入到讨论和规划的视野之中。1967年11月9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为了响应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要依靠革命派群众的最新指示，在自己的《井冈山》报第96期上用三个版面论述“教育革命”，发表了“招生工作研究小组”的一篇题为《关于改革大专院校招生工作的建议》的文章，该文提出：为了贯彻党的阶级教育路线，对各阶级按一定的比例招生，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应占新生比例65%以上，剥削阶级子女不超过5%。招生必须贯彻以群众推荐为主，考试为辅的步骤进行。推荐应占招生人数的60%左右。为缩小城乡差别，农村推荐学生应占20—25%。对五类学生不予以录取：1、家庭直系亲属中有被专政机关关、管者；2、走资派、牛鬼蛇神子女未与家庭划清界线者；3、文革中参加过反动组织且又屡教不改者；4、刑事犯罪者、反动言行者；5、长期不参加文革的逍遥派、书呆子。对于大学招生，“今后要彻底废除单纯分数考试制度，”“实行开卷考试。”（2）

清华文革“教育革命”真正开始的时间是在1969年初。显然，文革头两年的群众运动的论战和武斗无法使“教育革命”铺排开来，当文革群众两派围绕着权力斗争进行着生死较量之际，谁来具体领导“教育革命”还无从谈起。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清华大学发生了牺牲惨重的“百日大武斗”。（3）毛泽东以此为契机，一举扭转了大学的文革局面，终止了红卫兵造反派的“气数”，结束了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而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给教育界派出了新的领导力量——“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并从总体上把全国大学所有师生列入文革的对象。

工宣队进驻学校，为“教育革命”的全盘实施提供了基本的政治领导保障，换言之，大学师生不可能在“教育革命”中当家作主。工宣队进驻清华后，首先是在政治上对清华做出了一番变革。

从毛泽东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信（著名的“五七指示”）中不难看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被当作文革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因而，工宣队首先要做的就是否定和推翻文革之前的所谓旧清华。工宣队进驻之初，全国文革正进入“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阶段，在这一阶段，每一单位的成员都要从家庭出身、生活经历和社会历史关系等方面接受政治审查或“验身”，以确保文革“正统”阶级队伍的纯洁和统一。工宣队领导的这场重点清查个人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运动中，致使清华共有24人自杀身亡。1968年9—10月，清华先后召开6次全校万人大会，揪斗了91人，还召开了其他形式的批斗会。全校举办各种“学习班”，开展政策攻心和立案审查。12月和次年1月，又召开两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全校万人大会。在持续了两、三年的“清理阶级队伍”等一系列运动中，清华全校被立案审查的有1120人，定为“敌我矛盾”或“专政对象”的有167人。（4）这种人人过关甚至人人自危的运动，使得一些当事者今天回顾起来还心有余悸。相比较清华整个文革时期约有1228人被立案审查、178人被定为“敌我矛盾”或“专政对象”，可以想象，“教育革命”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异常恐怖、严峻和残酷的形势下来临的。

清华工宣队把自己的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写成《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1969年1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转发了这个报告。这个报告是对1949—1966年清华历史的否定和为随后清华乃至全国的“教育革命”所作的铺垫。它认为，清华大学“解放后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十分严重”；清华各级干部大都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要他们“承认错误”，才能“给予适当的工作”；清华教师“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要“进行再教育”；清华著名教授刘仙洲、梁思成、钱伟长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给出路”，“留着作反面教员”；父母在文革受到审查和打击的学生，只要同父母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同时对一些“反革命分子”加以打击。这个报告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向全国的文革运动推广的“六厂二校”经验之一。

1969年3月，清华又成为全国各界参观学习的典型单位，约有304个单位2.7万多人来清华听取经验介绍。工宣队领导人之一迟群指出清华有四个严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十分严重”，“教师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知识分子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工农、脱离实际）严重，追求成名成家”，“教职工队伍严重不纯，特别是教师队伍严重不纯。”（5）总之，清华是一个被称之为由于“修正主义泛滥”而几乎“烂掉了”的单位。工宣队进校后与大学生们辩论，工宣队指责大学生说：“你们会讲这国话，会讲那国话，就是不会讲毛泽东思想的话。要说知识分子臭，也就臭在这里。”（6）多少年来，“学校里有‘这个系，那个系，就是和工农兵没关系’。课堂上‘讲这个定理，那个定理，就是不讲革命的道理’。”（7）由此可见，清华“教育革命”来临的具体历史氛围。

“教育革命”要根本解决的是教育的政治性质和教育的政治方向。“实现彻底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政治建校，作为最根本的任务。政治建校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灵魂，是解决教育为谁服务、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如果不首先解决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而偏重于教学方式方法的研究，必然会导向修修补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8）所以，“教育革命”就是由工人阶级（实为工宣队）领导的政治革命，是一场关系到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各个方面的革命，是一场在教育界必须大搞群众运动的全方位的革命。“实践证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文化教育阵地领导权的斗争，始终是围绕着争夺知识分子群众问题展开的一场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在一定意义上讲，工人阶级占领文化教育阵地，就是占领广

大知识分子的群众。”〔9〕

“教育革命”给清华的教育体制带来了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清华当时的主导力量既不是党委的政治领导，更不是革命委员会的业务领导，而是工宣队的全盘领导，表面上形成的是工宣队、党委会、革委会“三权鼎力”的局面，但实际上工宣队的领导及其权威直接来自中共中央最高层。清华自1968年“七·二七事件”以后的领导力量主要是非清华的人员，主要来自中共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的军代表、北京卫戍区以及海军的军代表、北京市有关机关和企业的干部等，在1969年底才陆续有清华的原有干部被结合到清华领导班子。1971年之后，迟群、谢静宜成为清华的主要领导人。清华大学在文革中是毛泽东亲自抓的“点”，他派身边的人员迟群、谢静宜主管清华和北大等，这也就从某一角度表明了清华“教育革命”对于全国的典型影响和示范作用，并经由工宣队而赋予“教育革命”某些独有的特性。正是由此，文革“教育革命”是通过清华大学，具体地说是通过清华工宣队，普及到全国高等院校的。

工宣队成为“教育革命”的“总管”。无论怎样，所谓工人阶级对清华大学的“占领”、工宣队的领导乃至1968年下半年直至1976年10月初在清华大学“执牛耳”的领导人，都不过是凭借着毛泽东的权威，用迟群等人倍感自豪的话来讲，他们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兵”。这种大致上具有初中学历的“兵”能否真正“驾驭”清华的教育及教学、科研大业，可想而知！

针对工宣队一些成员不安心在清华工作，想回到原单位工作，工宣队举行学习班，安定军心，有人谈体会：“我们撤了，敌人就来了。”〔10〕仿佛在他们眼里，清华大学是一块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敌区”。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清华的系（所）、教研室（组）、实验室（车间等）、学生班级等一律按照军事建制分为营、连、排、班的层序，它们所显现的是“教育革命”准军事体制下的生活和运作。

清华领导人在1974年的总结中强调，他们顶住了排斥工人阶级领导的“歪风”，“保证各级领导班子中工人干部占二分之一以上。”〔11〕这是信口雌黄，因为在清华校一级的领导班子，工人干部的比例就远不到二分之一。1968年后的清华各级领导班子甚至整个大学的领导班子，大致上是由工宣队代表（工人干部和解放军干部，真正的工人几乎没有）、老干部和学生代表组成的，“革命教师”的代表席位不是没有，就是无足轻重。1970年后，在恢复和强调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同时，在清华乃至整个教育界中，工宣队却一直作为最高主宰。工宣队实际上驾驭了革委会和党委会。1969年初成立的清华革委会只不过是处理日常行政和教学事务的机构，1970年成立的清华党委会不过是“抓大事”即抓阶级斗争、抓知识分子改造和抓教育革命的部门。工宣队进驻学校，是完全来自学校之外的“钦差”，是文革“空投”到教育界的一个“怪胎”。在教育界之外，几乎没有与之相似或相同的工宣队的权威。工宣队实际上就是文革中、后期教育界的“臣宦官”。在恢复了学校的中共党的机构和领导之后，工宣队依然叠床架屋地行驶着大权，这势必造成学校党组织中“党内有党”直至“党外有党”的局面，最主要的是来自工宣队的干部与原有的学校干部的区别。

工宣队进驻学校，有多重的意义和功能。从当时来看，是为了恢复学校秩序，稳定学校局势，消除群众武斗，整合不同群众势力，力图把文革转移到与以往不同的有序阶段；从长远来看，是为了取得教育界的领导权力，整治甚至敌视知识分子，不相信学校原有的中共党的干部和党的组织，监督和改造学校的各种人员、各个方面，试图以崭新的“教育革命”改换整个教育事业，并为塑造文革的新人、新社会提供一个基地。

其二，清华的教育体制出现了以工人（实为工宣队人员）、学员、教师构成的“三结合”组

织体制。这里，无疑，工人是领导，学员是主体，教师是被改造和被使用的对象。

清华“教育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过去在校的“大学生”或“本科生”的称呼、称谓统统改变为“工农兵学员”（简称学员），以示与过去的大学生（文革中又被称为旧大学生）乃至整个过去的教育体制和传统区别开来，用文革的术语来说就是“决裂”。必须强调的是，“学员”这一用语绝不同于“大学生”、“本科生”或“学生”用语，前者的取向和内涵是后者们所无法企及的。从工农兵学员的培养和经历来看，“教育革命”是要把他们的政治标准而不是业务标准放在首位。“教育革命”的学员培养意味着力图造就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教育革命”的一个别出心裁的作法就是制造出教师与学员的隔阂甚至对立，抬高并夸大学员的地位和作用，把作为受教育者的学员视为政治上的领导者之一。“我们总是紧紧地依靠校内工人阶级和工农兵学员，把他们放在斗争的第一线，”让他们在教育阵地上冲锋陷阵，发挥生力军的作用，直接参加教学改革的各个环节，即受教育者参加办教育，还帮助教师改造世界观，同时改造自己的世界观。（12）1970年春，试招的清华大学工人班学员自发地提出一个口号：“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像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后来改成全国性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宗旨：“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一口号逐渐演变为文革时期大学的学员政治活动机制，主要用来在学员与教师之间划定一种明确的改造与被改造的界线。学员们在入学之际和入学之后，都一再被告诫不是简单地上大学，而是与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教师们争夺教育权，并要占领教育阵地。“工农兵上大学的根本任务是掌握文权、巩固政权。”（13）因而，“对待工农兵学员的态度就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14）

这时，1949年前的清华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1966年前的清华宗旨“培养又红又专的工程师”，被“上、管、改”口号所取代，并出现了校、系甚至班级的学员“上、管、改”组织。这种组织与过去的学生会、学生党团组织不同，它是监督、改造教师的组织。学员们不断受到告诫：不要忘记自己的工农兵“主人翁”地位和意识，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教育的回潮和旧知识分子的复辟”。“上、管、改”一类的组织在清华以及其他大学的出现，仿佛农村土地改革时期的“贫农协会”，被视为推行“教育革命”的一支群众队伍。

其三，“教育革命”伊始，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一起在全国率先提出“砸烂教研室（组）”，指责教研室（组）是“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三脱离’的单纯教学单位”，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独立王国”是“只讲教学、科研，不关政治路线”的修正主义组织。“旧大学教学组织体制的基层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教研组，它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服务的。它从组织上造成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分离、教员与学生分离、各门课程彼此之间分离。在这样的组织下，广大工农群众进不来，广大工农兵学员无法参与教育革命重大问题的决定，世袭领地的气味甚浓，修正主义‘业务党’、‘中庸之道’等黑货极易泛滥，对修正主义复旧走老路的抵御能力甚微，对‘老三段’（指“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教育体系十分适应，而对加强工人阶级领导和教育上一系列变革阻力却很大，其要害是排斥工人阶级领导，阻碍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我们改革组织体制，根本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打破‘黏土’成堆的‘教研组’体制，将‘黏土’散到沙子堆中去，多种方式使工人、学员、教员结合在一起，组成新的教育基层单位，这样，就使在基层组织中组织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加强了工人阶级领导。”（15）具体作法就是解散教研室（组），把教师编入学员班。教师的工作置于学员的班级之中，教员的一切教学计划、教学任务和政治活动由学员班级党支部来讨论、决定。作为中国大学体制的基层单位，教研室（组）的设立引自苏联，清华此时取消教研室（组）的作法，已不是简单地否定苏联经验的问题，而是取消教研室（组）的知识分子构成和业务性质，实施和体现“教育革命”新体制所具有的“改造并分化知识分子”的功能。

1970年7月22日，清华工宣队发表了《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以下简称《创办》），概述了清华“教育革命”的主要经验。这份经过姚文元等人修改、张春桥定稿的文章可称得上“教育革命”的“范式”。以《创办》为标志，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方案首次以比较系统、权威的形式出现，它又被称之为“教育革命的‘圣经’。”（16）《创办》还是1971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某种“雏形”。

《创办》总结的清华“教育革命”的六个内容分别为：一、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二、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三、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四、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五、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六、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在清华连续四年没有招生并中断正常教学的情况下，《创办》真可谓“理论先行”，为文革的大学办学画出了“蓝图”。《创办》所提出的体制、师资、课程、开门办学、教材、教学方法等，对于文革时期的大学办学具有指导意义，标志着文革“教育革命”体制的初步形成，成为文革时期全国通行的大学教育大纲。

清华“教育革命”随同整个文革，把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当成文革及其“教育革命”的一个主要对象。经过1971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这种以知识分子为潜在敌的做法得到了某种“证据”。这著名的“两个估计”是指：一、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界所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二、原有教师队伍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17）其实，这“两个估计”在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显示出来了。

1970年秋季之后，许多清华教师愈益感受到“两个估计”如同两座政治大山压迫着自己，尤其是对于“教育革命”把教师的世界观当成异己的这种束缚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紧箍咒”做法，大为不满。这种对于教师所采取的可用而不可信的政策，实质上是赤裸裸的歧视加敌视，特别是对于那些1949年之后到1966年之前学成而就业的教师来说，不啻是一种巨大的失落感甚至沦丧感。他们一些人不是直接针对“五七指示”，而是针对上述纪要，提出了批评。一时间，关于如何看待“两个估计”，成为清华“教育革命”斗争的焦点之一。清华工宣队一再强调，“否定两个估计，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18）他们引用毛泽东在1967年2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为根据：“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19）这也就再次表明，一方面，文革把阶级的以及阶层的划分标准从过去的经济地位、家庭出身改变为现今的职业、知识直至世界观，这不能不说是文革阶级划分法的一个独创；另一方面，由世界观问题来把知识分子当成文革中的“另类”，这也就使得文革由荒唐的“政治革命”必然伴随着某种闹剧般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思想革命”。

清华“教育革命”自1969年初以来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受到了许多清华原有的干部和教师的斥责，他们尽其可能地予以纠正或修补。他们借着1972年周恩来关于教育整顿的指示精神，试图恢复过去某些合理的教学做法和实行某些改革的工作措施，遭到了打击和迫害。1973年10月至12月，清华上上下下开展了一场名为“三个月运动”，这场运动也是清华“教育革命”所经历的第一场大的斗争，它整治了被称为体现着“旧教育路线回潮”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一大批清华干部和教师，有64人受到立案审查和

重点批判，403人被点名批判，被点名指责的或被迫作检查交代的人为数更多。（20）正如清华当时的材料所总结的，这场运动表明，教育阵地的主要危险依然是修正主义。“（有人）硬把林彪的极右路线说成是极‘左’路线，以此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学校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亦步亦趋，紧密配合，极力煽动批极‘左’，实际上就是在批文化大革命，批教育革命，批革命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这种代表人物强调“‘教育革命进入业务领域，工人不懂业务，没有实际领导权’，他们在党的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专家’，在群众面前把自己装扮成党的干部，以业务为武器，来反对工人阶级领导”，这实质上“就是进入一个不要工人阶级领导，不要无产阶级政治，不要改造世界观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所以有市场，复辟资本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形成一股潮流，就在于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成了修正主义的肥沃土壤，不改造就会本能地倾向修正主义。”文革教育体制发生的主要变化是撤销原来的教研组（室），实行厂校挂钩，互为基地；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师生合编；基础课教师下到各个专业等。这些“教育革命”的作法受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责，一时间出现了“厂带专业害死人”，新教育组织体制“不正规、不像个大学样子，是所谓连队办大学，搞得‘质量低了，理论弱了，秩序乱了’”等说法。一些单位恢复了过去的旧组织体制。“资产阶级为了推行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总是要恢复旧的组织体制。因此，恢复知识分子成堆的旧教育组体制，就成为他们复辟的组织手段之一。”（21）这场运动还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同批判孔子及林彪的“克己复礼”联系起来，说这次回潮的代表人物们“总是梦想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复兴蒋家王朝的‘礼’，复兴封资修教育路线的‘礼’。”他们以林彪事件为契机，错误地估计形势，大加指责文革的新生事物。“他们为什么对批极‘左’那样感兴趣？实际上是借批极‘左’来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新生事物。”（22）在“教育革命”方面，“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从四个方面加以否定：一是恶毒攻击文革。他们认为，文革使“城门失火，殃及鱼池”，“伤了元气”，“害得好苦”；文革“执行了极‘左’路线，把人的思想搞乱了”，“后遗症很大”，“不是有所得，而是有所失”，文革“完完全全失败了”；二是反对工人阶级领导；三是诽谤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道路，认为文革开始后没有真正的大学生；四是极力抗拒工人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说什么走“五·七”道路是“珍珠入土，上当受骗”，“外国卫星上了天，中国教授下了田。”认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及其做出的“两个估计”是“极‘左’思潮的产物”，“用这两个估计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没门儿。”（23）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